

张广达文集

文书 典籍与西域史地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张广达文集

张广达 著

文书

典籍与西域史地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书、典籍与西域史地/张广达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6

ISBN 978-7-5633-7521-9

I. 文… II. 张 III. 西域-地方史-文集
IV. K294.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4694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 125 号 邮政编码:250001)

开本:965mm×670mm 1/16

印张:21.5 字数:291 千字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5 000 定价:4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 序

我衷心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刊行我的文集三种。在表示感谢的同时,我想利用这一机会,对我的学习经历和文集内容略作说明。

我 1953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但在 1957 年教员资格被取消。1970 年代末恢复教职后,我的教学和研究领域是隋唐五代史、中亚中古史、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与文物、中外文化交流史。

种种际遇使我较早接触了中亚史地和中外文化交流两个领域,从 1950 到 1970 年代,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我和父亲张锡彤先生利用运动的间隙,一起翻译俄国学者巴托尔德(V. V. Barthold, 1869—1930 年)的《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在当时情况下,这样做,只是为了使自己觉得似乎没有旷日持久地荒废光阴,稍获念书人的心灵安慰。始料未及的是,在翻译巴托尔德书的过程中,我时时被巴托尔德治学的专注和敬业的虔诚所震撼。同时,由于翻译巴托尔德,我进而知道西方有专注于阿拉伯文献的卡·布洛克曼(C. Brockelmann)、德·古耶(M. J. de Goeje),专注于波斯文献的约·马迦特(J. Marquart [Markwart])、布劳恩(E. J. Browne),专注于中亚出土文书的缪勒(F. W. K. Müller)等大家。由此,我开始注意这些西方学者研究文史的规模、气象及其与我国学者徐松(1781—1848 年)、王树枏(1851—1936 年)、陶保廉(1862—1938 年)、王国维(1877—1927 年)等治学路径的同异,并从他们身上寻求我的精神寄托。1978 年重上讲台后,我不顾自己的学殖荒芜,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文章。此次出版的

三种文集是我 1978 年以来的一些文字的结集。

我衷心感谢一些学侶，此次大力帮助我将历年刊出的不曾分类的文章厘定为三辑，使得每辑文章各有侧重，取向略有不同：

第一辑为《文书、典籍与西域史地》。多年以来，我一直感到，西域研究和地中海世界研究一样，具莫大魅力。每当学人解破一件西域出土的关键性文书，就会感到兴奋莫名。与地中海世界相比，西域的绿洲和沙碛似乎总是在默默地，但是持续不断地提供更多有待人们揭破的奥秘，举世对内陆亚洲丝绸之路的研究盛而不衰就是明证。就文化内涵的多样而言，特别是就多元文化汇聚与交流方面的丰富性而言，西域值得学人像法国年鉴学派或者说整体史学派费尔南·布劳代尔（Fernand Braudel, 1902—1985 年）处理地中海世界那样，认真进行一番架构，进而展开综合性研究。收入本辑中的文字虽然全都局限于西域的一时、一地、一事，但是笔者在写作过程中无时或忘各种史籍中有关多元文化在西域的汇聚与融合的记载以及相关的出土文书文物。笔者力图通过对西域的时空间架中的一时、一地、一事的叙述与分析，说明文化汇聚的情景和较长时段的历史发展面貌，借以提示西域史地和中西文化交流有诸多棱面可供研究。收入本集中的一些文章发表较早，此次结集，各位学侶帮助我改正了错字、标点，润色了文字。遗憾的是，在一些文章后面所加的“附记”中，笔者没有可能做较大的补充，以反映后来陆续解读的西域古文献、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与后来的学术进展面貌。

第二辑为《文本、图像与文化流传》。自 1900—1901 年起，在我国大西北地区的敦煌障塞故址和塔里木盆地边缘上的绿洲废墟，次第发现了汉晋时代以来的简牍、胡语文书和带有图像的文物。简牍、胡语文书和图像文物发现之初，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发现将会为学术研究带来怎样的转折。为时不久，人们在考释简牍内容和检阅传世文献的过程中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简牍的词句虽然简略，但是经过和文献记载互勘、互证、互

补,可以阐发简牍和文献记载的丰富内涵和某些若明若暗的细节。不仅如此,作为一种出土史料,简牍显然比书本记载更多反映历史情状,古代生活中的不少情节端赖出土简牍而再呈现。至于胡语文书和图像文物的作用更是如此,许多历史时空中已经失落的文明篇章或湮没不彰的情节借此而得重显于世。从此,人们研究汉晋以来历史,只要有简牍、胡语文书、图像文物等新史料可资参证,人们便会逸出文本记载的范围,不再让自己局限于传世文献。套用近年西方流行的“语言的转折”(linguistic turn)一语,我们无妨说,在研究中外文化关系史上出现了一个“文献的转折”(documentary turn)。学术研究从此受到文本、胡语文书、图像文物等大量新材料的推动,气象日新月异。

笔者侧重研究唐代的中外文化的交流。笔者每当在美国看到长途汽车公司之一以灰狗(greyhound)为商标,在法国看到邮局用 cheetah 豹的生动图像为特快邮递件(chronopost)做广告,我的思路就不禁回到唐代贵族陵墓壁画上的文豹或猎豹的图像上来,也不禁想到克罗齐(Benedetto Croce, 1886—1952年)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许多唐代出土文本和图像史料,如果把它们放在亚洲的范围,进而放在世界的范围内考察,那么,隋唐时期呈现的中国文化面貌,显而易见,是多种文化融合的结果,对之进行考察的视阈既不能限于长安洛阳,也不能限于以安西四镇为重点的西域。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的多元,而非思想的一统,成就了唐代的辉煌。渊源于西亚北非的摩尼教文本残片和来自西亚的祆教性质的图像等大量新材料的出土,正是对这种开放性和多元化文明的细节表述。本辑所收文章是一些个案研究,用意在于探讨中古中国与外部世界在物质生活和思想观念等不同层次上的交互影响。

第三辑为《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此辑收录了出于不同起因和不同情况而写的一些文章,因为多少都与学术史有关而汇辑在这里。百年来,中、日、英、法、德、俄、美、荷、意、匈等国的汉学和东方学的发展情况是我感兴趣并至为关心的课题。我看到,不同国家的学术生态和具体语境不

同,导致各国汉学家和东方学家的知识结构不同,然而在诸多不同中,又存在着一些可资互相参照的共同点。为了使论述不流于空泛,我选择几位在汉学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历史学家作为研究个案,分析他们的治史风格,同时也探索个人风格得以形成的社会环境,考察他们在学术转型中的不同作用。王国维、内藤湖南(1866—1934年)、沙畹(Emmanuel-É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年)及其门生巴托尔德、恒宁(W.B.Henning, 1906—1967年)等人一直是我心目中崇敬的对象,在本辑中,恒宁等还没有涉及,其他几位宗师的业绩虽然被选作研究课题,但是既没有写完,更没有写好。留意他国的汉学和东方学使我深受教益,本辑中,我对中古史研究的许多观点和思考,就来自比较不同国家的治学路径所受到的启发。此外,卜德(Derk Bodde, 1909—2004年)与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年)关于中国有没有现代科学的激辩,也是我始终关注的课题,我一直盼望我能够就这一课题做些工作。

出国二十年,我有两点体会日益深刻。(一)现代性的特征之一是注重反思,特别是注重自反性的或反身性的批判思考(reflexivity)。我感到,历史学不仅要注重对个别的史料、史实、史事批判性分析,而且也需要对整体的史学思想传承和史学发展脉络进行批判性反思。(二)如果我们想要或多或少赋予自己研究的课题以历史学意义,那么,在具体的研究之中取得历史知识学(historical epistemology)层次的一些认识——哪怕是一些肤浅的认识——便至关重要。现代化阶段的史学研究,显然不能再局限于传统的有限的、封闭的思考架构中就事论事,因而我们应当充分重视深入细致地比较一些相近的个案,以小见大,得出具有普遍参照意义的认识。

上世纪80年代末至今,我四处游学,有失有得。因为中外同行的热忱支持,间有基金会的资助,我参加了一些高校的教学和研究机构的科研活动。作为参与者(actor),我得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中国大陆之外的学术环境,体验多种不同的学术氛围。参照塞尔多(Michel de Certeau,

1925—1986年)论证的“他者”(the other)说,我时时检视并修正过去身在国内形成的单向思路。另一方面,实地考察欧美及日本在社会与人文学科领域的重要成果,有助于我调整自身的知识结构,中国历史的一些问题在距离拉开之后凸现出来,促使我作进一步的思考。只要精力允许,我将继续这些工作,整理分析已经搜集的有关中外文化交流和中、日、法、俄等国汉学家的资料,完成我手头的几件“半成品”,庶不辜负师友多年来对我的深切关怀爱护。

最后,在三部书稿的出版过程中,荣新江、朱玉麒、许全胜、孟彦弘、姚崇新、雷闻、陈怀宇、陈明、党宝海、余欣、杨晓燕、朱丽双、李丹婕等人承担了大量的实际工作,付出了很多努力,在此我深表谢意。令我特别感激的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为此而费心尽力,作为整个出版工作的统筹者刘瑞琳女士,做了种种安排,甚至派遣编辑来巴黎协助我的工作,在此我深致谢意。

张广达

2008年5月24日于巴黎

目 录

总 序 / 1

西 域

碎叶城今地考 / 1

附:阿克·贝希姆城址 / 23

唆里迷考 / 25

附:贵霜 / 42

附:吐火罗 / 44

关于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词汇》与见于此书的圆形地图 / 46

附:黑汗王朝 / 67

唐代龟兹地区水利 / 71

隋唐西域 / 80

附:裴矩 / 86

附:王玄策 / 88

附:勃律 / 90

敦煌吐鲁番

吐鲁番绿洲及其探险简史 / 92

唐灭高昌国后的西州形势 / 114

有关西州回鹘的一篇敦煌汉文文献——S.6551 讲经文的历史学研究 / 153

附:回鹘 / 177

唐末五代宋初西北地区的般次和使次 / 183

“叹佛”与“叹斋”:关于敦煌文书中的《斋琬文》的几个问题 / 192

写于公元 368 年之前的《法句经》残卷 / 211

西藏与蒙古

吐蕃飞鸟使与吐蕃驿传制度——兼论敦煌行人部落 / 215

九世纪初吐蕃的《敕颁翻译名义集三种》——bKas bcad rnam pa gsum / 226

唐代禅宗的传入吐蕃及其有关的敦煌文书 / 242

附:赤松德赞 / 263

附:莲花生 / 265

评《西藏的历史和语言——乌瑞七十诞辰祝寿文集》 / 267

蒙元时期大汗的斡耳朵 / 272

书 评

评《古代和中古早期东突厥斯坦史纲》 / 291

评介《古代和中世纪早期的西域》 / 296

碎叶城今地考

一 考证唐代碎叶方位的意义

碎叶是我国唐代的西陲重镇。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公元5世纪已有此城,11世纪时,它的地位为新崛起的黑汗王朝都城之一八剌沙衮所取代,其后湮没无闻。

今天,碎叶所以被人们注意,显然有两个原因。一是它与我国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家世有关,它作为李白的出生或其父祖活动的地点而经常被学者们道及¹。二是探讨碎叶的方位具有现实意义,确定碎叶的位置将无可辩驳地证明:早在唐代,中国政府已在碎叶设镇,推行政令到伊塞克湖以西直到怛逻斯地区。

实际上,研究碎叶的历史还具有其他方面的意义。碎叶作为唐代安西四镇之一,曾经有过一段繁荣昌盛的历史。它不仅是唐代设官置吏的军镇,而且是我国兄弟民族西突厥十姓可汗、突骑施、葛逻禄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西南地区兄弟民族吐蕃的活动舞台。研究唐代碎叶城的沿革,有助于阐明唐代我国西北地区各民族共同缔造祖国历史的具体过程。

碎叶在唐代是中国与中亚、西亚往来交通的要冲,在东西文化交流中

¹ 陈寅恪《李太白氏族问题之疑问》,《清华学报》第10卷第1期,1935年。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第3—16页,《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节。参看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丹铅新录》五,1896年广雅书局本,卷九,叶一至叶八下唐代到明代学者们的有关论述。

起过巨大的作用。627年(唐太宗贞观元年),玄奘发足长安,西行赴印²,大概在628年到了素叶水城,亦即碎叶城,由此前往河中、阿富汗和印度。696年(武后万岁通天元年),大食准备赠给中国的狮子,据说也将“远从碎叶,以至神都”³。《元和郡县志》卷四〇“庭州”条下特别揭出自黑水守捉渡伊丽河(今伊犁河)以至碎叶的碎叶路,这也是碎叶在唐代中西交通中地位重要的又一明证。可以说,7至10世纪,从天山以北的别失八里西行,经伊犁去中亚也好,或从天山以南的阿克苏启程,越天险勃达岭经热海去中亚也好,都必须行经碎叶。

碎叶地位的重要,在唐诗中也有反映。人们从唐代《塞上曲》、《塞下曲》、《从军行》等一类边塞诗中,可以看到在诗人笔下,碎叶成为边塞城镇的象征之一,常与轮台、楼兰等古城并列。当然,我们不能以诗人的吟咏与历史记述等量齐观,然而,这些诗篇反映了碎叶在唐代中西交通史上的重要地位这一点则是毫无疑义的。

二 关于碎叶的两个疑问

关于唐代碎叶的地理位置,长期以来存在着两个疑问。

首先是唐代设置的安西四镇中,碎叶时有时无,存在着碎叶与焉耆互相交替的情况。这一疑问早在唐代即已产生。唐人苏冕在编纂《唐会要》时就提出:“咸亨元年(670年)四月罢四镇是龟兹、于阗、焉耆、疏勒;至长寿二年(693年)十一月,复四镇敕,是龟兹、于阗、疏勒、碎叶。两四镇不同,未知何故。”⁴苏冕是唐德宗时(780—804年)人,编定高祖至德宗九朝政

2 《大唐西域记》赞称玄奘于“贞观三年仲秋朔旦,褰裳遵路,杖锡遐征”(季羡林等校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40页)。近年学者们认为玄奘西行始于贞观二年或贞观元年,尚无定论。此处暂从元年说。

3 《旧唐书》卷八九《姚珣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903页。

4 王溥《唐会要》卷七三,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326页。

事,成《会要》四〇卷,后经王溥重编。苏冕发现四镇前后说法不同,因而致疑,足见这在当时已经是一个不好处理的问题。关于这一疑问,不少学者已反复加以探讨⁵,兹不具赘。

与上述问题相因而至的另一疑问是:碎叶究竟是位于热海以西,抑或在焉耆另有一个碎叶。谓碎叶近在焉耆,始于宋代欧阳修、宋祁所修之《新唐书》⁶。又《资治通鉴》卷二〇二胡三省注以碎叶城为焉耆都督府治所⁷,因此碎叶所在何地遂两歧其说。至于近年,郭沫若更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断言碎叶有二,他说:“考碎叶在唐代有两处,其一即中亚碎叶,又其一为焉耆碎叶。”⁸最近印行的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第3册附有一幅《唐朝及四邻方位略图》,图中在焉耆之旁注记了碎叶镇,在热海以西、碎叶水以北注记了碎叶城。这种碎叶东西并存或以城与镇区分为两个碎叶的处理方法并未澄清问题,勿宁说反而增加了人们的困惑。

同名之城在中亚地区并非罕见,如拔塞干城之分为上、下,下拔塞干位于怛逻斯城东,上拔塞干位于热海南岸;又怛逻斯除塔拉斯河中游南岸之怛逻斯外,另有地名曰多逻斯、大塔拉斯、小塔拉斯、库米—塔拉斯、欣金塔拉斯等;蛰失密一名,看来也非专指一地。凡此种种,皆有文献足征。然而,关于碎叶所在,或谓东西莫卜,或谓东西并存,却难令人首肯。遍检可资印证的唐代西域地理文献和资料,包括粟特语国名表(*Nafnāmak*)、敦煌卷子中的汉文地志图经之类残卷、所谓“钢和泰卷子”中反映925年情况的和阗—塞语行纪部分、伯希和编号1283号藏文卷子,特别是与焉耆

5 参看大谷胜真《论安西四镇的建置及其异同》,载《白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1925年,第271—292页。松田寿男《碎叶与焉耆——关于安西四镇的异同》,初稿载《市村博士古稀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1933年,第1111—1134页,汉译文见杨炼《西北古地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增订稿《碎叶与焉耆》,载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56年,第357—391页;又见1970年增订版,页同。

6 《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四镇都督府”条,北京:中华书局,1975,第1134页。

7 《资治通鉴》卷二〇二“高宗调露元年(679年)秋七月”条下,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391—6392页。

8 郭沫若上引著作,第3页。

有关的回鹘文《弥勒下生经》(Maitrisimit)题记等等,直到目前,都找不到碎叶位于焉耆的任何线索。上述文献可以帮助我们断言的是焉耆的名称先后为乌夷、阿耆尼、唆里迷、恰里斯、喀喇沙尔等,唯独无助于我们在焉耆或其近旁寻觅碎叶城的踪影。

焉耆之地既无碎叶,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依据胡三省的碎叶在焉耆的注文,反过来在碎叶河畔找一找焉耆呢?这样找的结果却使我们发现,《新唐书·地理志》本身的记载前后并不一致,卷四三“四镇都督府焉耆”条下固然缀上了碎叶的字样,可是同一卷内征引的贾耽《皇华四达记》所记焉耆至安西(即龟兹)的路程,又同书卷四〇所记西州至焉耆的路程均未提到碎叶,更未见在碎叶之旁有焉耆的记载,这就使“四镇都督府焉耆”条的记载在同一卷中失去了着落。

三 从汉籍和穆斯林地理文献看碎叶的方位

在所有提到碎叶的历史文献中,就今所知,以唐代玄奘留下的记述为最早⁹。玄奘于628或629年亲履其地,后来传述了自己的行程。他指出自热海(即伊塞克湖)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叶[水]城(亦即碎叶城)。城周六七里,诸国商胡杂居。素叶城西行四百余里至千泉,千泉西行百四五十里至怛逻斯城。

公元751年(唐玄宗天宝十载),杜环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在怛逻斯与大食人交战被俘。762年(唐肃宗宝应元年)随商舶返国,著《经行纪》,被杜佑采入《通典》若干条,其中述及碎叶情况,也指出勃达岭北行赢千里

9 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素叶水城”条,第71页。在穆斯林文献中,碎叶一名大约以见于阿拉伯历史学家阿布·贾法尔·穆罕默德·伊本·贾里尔·塔巴里(al-Tabarī,卒于回历310年/公元923)所撰《年代记》一书为最早,此书的德·古耶刊本,第2卷,第1439—1441页述及:“(回历103/公元721—722年)一批粟特人自其故土外迁。……他们的首领卡尔赞支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提出三种可能由你们选择……’这些人不接受他的意见,于是他说:‘大家既不以为然,那么就前往碎叶吧。’”转引自弗·阿勒泰姆《匈奴史》,柏林,1969年增订版,第2卷,第116—118页。

得碎叶川,其川东头有热海,西头有城名怛逻斯,碎叶川有碎叶城¹⁰。

稍晚于杜环,唐代地理学家、德宗贞元间(785—804年)宰相贾耽(730—805年)搜集了边州四达的详细路程,其片断保存在《新唐书·地理志》中。贾耽所记自安西西行的路程如下:

……又四十里度拔达岭。又五十里至顿多城,乌孙所治赤山城也。又三十里渡真珠河,又西北度乏驿岭,五十里渡雪海,又三十里至碎卜戌,傍碎叶水五十里至热海。又四十里至冻城,又百一十里至贺猎城,又三十里至叶支城,出谷至碎叶川口,八十里至裴罗将军城。又西二十里至碎叶城,城北有碎叶水,水北四十里有羯丹山,十姓可汗每立君长于此。自碎叶西十里至米国城,又三十里至新城,又六十里至顿建城,又五十里至阿史不来城,又七十里至俱兰城,又十里至税建城,又五十里至怛罗斯城。¹¹

《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四“北庭大都护”条下还记载了庭州至碎叶城的里程,这是唐代在天山以北西通碎叶的又一条道路。

在穆斯林地理文献方面,公元9至11世纪,阿拉伯地理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撰《道里与诸国志》¹²、库达玛·本·贾法尔撰《税册》¹³、波斯佚名

10 杜佑《通典》卷一九三,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275—5276页。参看北京图书馆藏王国维抄校本《杜环经行记》,此抄校本系王氏从明李元阳刊本《通典》抄出,并与《太平寰宇记》引文校勘。《新唐书》卷二二下《西域传》下“碎叶”条(第6246页)词句与《经行记》略同。

11 《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第1149—1150页。

12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约生于回历205/公元820年或回历211/公元825年,卒于回历300/公元911年。据巴比耶·德·梅纳尔考证,“胡尔达兹比赫”在中世纪波斯语中意为“太阳的赐予”,从而推断其为波斯人后裔。他曾任阿拔思哈里发朝某省邮驿长官,其后与宫廷接近,故能利用大量官方文书。回历232—233/公元846—847年间,他根据前人的地理著述和官方文献,纂成《道里与诸国志》一书的初稿,叙述各省区的道里与税收;继于回历272—274/公元885—887年加以修订增补,完成二稿。由于他所依据的前人著作多已亡佚,《道里与诸国志》一书遂成为流传至今的最早的阿拉伯地理著作。自19世纪末叶以来,此书备受东方学学者的

作家撰《世界境域志》¹⁴、波斯作家加尔迪齐撰《记述的装饰》¹⁵，都记述了从怛逻斯到碎叶一带的自西徂东的城镇道里。我国新疆喀什噶尔人马合木·喀什噶里撰《突厥语词汇》¹⁶中有关条目也提供了宝贵资料¹⁷。上列著作中的有关记载虽然详略不等，但配合起来，可与玄奘、杜环、贾耽记载的自碎叶西行的路程互相印证。兹将此等有关记载试行排比论列如下：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说：

从怛逻斯至下拔塞干三法尔萨赫¹⁸。……而后至富庶大城俱兰四

(续上页)推崇，巴托尔德称之为阿拉伯地理文献中最可珍贵的部分，见《巴托尔德著作集》第8卷，莫斯科，1973年，第515页；维特(Wiet)称之为阿拉伯人文地理学开山之作，见维特《阿拉伯文献绪论》，巴黎，1966年，第102页。此书先经巴比耶·德·梅纳尔刊出，附以法译文，载1865年《亚洲学报》，所据写本不佳，字句颇有讹夺。其后德·古耶根据较多写本重加校订，收入他编辑的《阿拉伯舆地丛书》(BGA)第6卷，莱顿，1889年，亦附有法译文。

13 库达玛，全名库达玛·本·贾法尔，生年不明，卒于948或958年。所撰《税册》，成书当在回历316/公元928年以后。他根据的材料大部分与伊本·胡尔达兹比赫书相同，但增加了许多注释性的说明。维·米诺尔斯基疑其原为写于胡尔达兹比赫书叶边的注释，后经抄手录入正文，见《世界境域志》英文译注本，1937年，第291页注③，1973年博思沃思刊行新版同。此说可能得实。《税册》一书由德·古耶校订刊行，收入《阿拉伯舆地丛书》第6卷，莱顿，1889年。

14 波斯佚名作者的《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是写于回历372/公元982—983年的一部波斯文地理著作。在现存的穆斯林地理书中，以此书介绍中亚中古地理最为详尽，然直接涉及碎叶城的材料较少。此书只有一份抄本存世，共38叶，1930年影印于列宁格勒；维·米诺尔斯基译为英文，并加详注，1937年刊行于伦敦；1973年由博思沃思增订，刊行新版。

15 加尔迪齐的波斯文著作《记述的装饰》(Zayn al-Akhbār)写成于1050年。关于此书刊本及校订情况，参看蔡克雷迪《加尔迪齐论中亚历史》一文，载《匈牙利东方学报》第27卷第3期，1973年，第257页及以下。加尔迪齐书中记载突厥的专章，有戈扎·库恩的匈牙利文译注和巴托尔德的波斯原文摘录及相应的俄译文，后者刊于《巴托尔德著作集》第8卷，1973年，第23—62页。

16 亦译作《突厥语词典》、《突厥语辞典》，今汉译本作大词典。

17 马合木·喀什噶里生当11世纪，出身于建立黑汗王朝的汗族。他研究了突厥语的各种方言，所编《突厥语词汇》成书于11世纪70年代。此书为突厥语言学的奠基之作，仅有孤本写本存世。现在则有1914—1916年穆阿里姆·里弗阿特刊本，1938—1957年贝希姆·阿特莱伊编土耳其语言学会刊本，1960年以来复有乌兹别克语、俄语译本。

18 拔塞干或译八儿思罕或八儿思汗。原文作下努尔斯罕，早在1889年即为陶玛舍克(W. Tomaschek)订正为下八儿思罕，见陶玛舍克《评德·古耶撰〈论果戈与玛果戈墙〉一文》，载《维

法尔萨赫。而后至大城米尔奇四法尔萨赫。而后至阿史不来四法尔萨赫。至大城弩支卡特八法尔萨赫。至大城哈朗扎旺四法尔萨赫。至朱勒四法尔萨赫。至大城萨里克七法尔萨赫。至突骑施汗廷四法尔萨赫。至纳瓦卡特四法尔萨赫。至科帕勒三法尔萨赫。而至上拔塞干¹⁹，该城为中国边界，商队经历草原至其地十五日程，突厥驿骑为三日程。²⁰

上引段落中的科帕勒即碎叶，库达玛书有明确说明：

从怛逻斯至下拔塞干三法尔萨赫。……由此至类似先前地带之俱兰四法尔萨赫。……自俱兰至富庶大城米尔奇四法尔萨赫。经类似俱兰库姆之沙漠至阿史不来四法尔萨赫。至大城弩支卡特八法尔萨赫。至大城哈朗扎旺四法尔萨赫。至大城朱勒四法尔萨赫。至大城萨里克七法尔萨赫。至突厥汗廷四法尔萨赫。至 Kirmrau(?) 二法尔萨赫。至纳瓦卡特二法尔萨赫。纳瓦卡特为大城，一条名叫泽卡特(?) 的大路直通上拔塞干城。自纳瓦卡特至潘支卡特一法尔萨赫，潘支卡特之旁有村名泽卡特(?)。自潘支卡特至碎叶城二法尔萨赫，碎叶城包括两城，一为科帕勒，一为萨兀尔科帕勒。自后一地启程至上拔塞干，该城在中国边境上，对于沿草原及给水处时常停留的驼队而言，行程为十五日，但对于突厥驿骑则为三日程。²¹

(续上页)也纳东方学杂志》第3卷,1889年,第103—108页,转引自巴托尔德《蒙古时期以前的中亚基督教》,《巴托尔德著作集》第2卷,第2分册,第282页;斯图贝德译本,1901年,第36页。陶玛舍克的订正已为其后发现的马合木·喀什噶里《突厥语词汇》一书所证实(里弗阿特刊本第3卷,第308页;阿特莱伊刊本第3卷,第417页)。

19 或译上八儿思罕或上八儿思汗。原文作上努尔斯罕,今据马合木·喀什噶里书订正。

20 《道里与诸国志》,见德·古耶刊《阿拉伯舆地丛书》第6卷,阿拉伯原文第28—29页,法译文第21页。

21 《税册》,见德·古耶刊《阿拉伯舆地丛书》第6卷,阿拉伯原文第205—206页,法译文第157—158页。文中泽卡特,阿拉伯原文作拉卡特,此据加尔迪齐书校改。